



山口淑子

藤原作弥

李香兰——我的前半生

假冒中国人的自白

假冒中国人的自白

李香兰

——我的前半生

〔日〕山口淑子 藤原作弥 著

巩长金 孟瑜 译



李香兰——我的前半生

(日) 山口淑子 著  
藤原作弥

巩长金 孟瑜 译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解放军出版社激光照排

一二〇二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280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 000

ISBN 7-5065-0728-5/I·101

定 价: 4·85元

##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山口淑子（现日本参议院议员—大鹰淑子），以她的艺名—李香兰所写的一本自传体回忆录。

李香兰，是日本侵华时期红极一时的歌星和明星。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二日出生在中国东北沈阳近郊的北烟台，后随其父山口文雄移居抚顺。一九三三年，在奉天（沈阳），被其父的结义兄弟、伪沈阳银行总裁李际春认为义女，取名李香兰；一九三四年，在北京又被伪天津市长潘毓桂收为义女，改名潘淑华，进入北京翊教女中，从此她便由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逐渐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冒牌中国人。

一九三三年，她首先被奉天放送局（现辽宁广播电台）吸收为演唱“满洲新歌曲”的歌手，一九三八年，则以李香兰的艺名，成为满洲映画协会（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正式演员。从此，她作为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文化领域推行侵华政策所利用的工具，先后主演了《蜜月快车》、《富贵春梦》、《冤魂复仇》、《东游记》、《白兰之歌》、《黄河》、《迎春花》、《支那之夜》、《我的黄莺》和《万世流芳》等影片，随之而走红，成为东方大明星。

另外，她还演唱和灌制了许多唱片，如：《白兰之歌》、《苏州夜曲》、《支那之夜》、《何日君再来》、《夜来

香》、《卖糖歌》、《戒烟歌》等歌曲。这些靡靡之音不仅麻痹了当时人们的抗日斗志，也风靡了整个日本。一九四一年，她初次在东京日本剧场公演时，群众为了抢购戏票，曾造成了排队七圈半的骚乱事件。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她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以“文化汉奸罪”和“间谍嫌疑罪”关押，险些被判处死刑。后来，军事法庭根据她提出的日本国的“户籍誊本”和其他旁证，证实了她确是冒充中国人的日本人之后，只给予“在伦理和道义上背叛了中国”的谴责，随后将她释放并遣返日本。这一点同男装女谍川岛芳子恰恰相反——川岛芳子本是中国人而冒充日本人，最后拿不出日本国的“户籍誊本”，结果被枪毙。

李香兰在一九四六年四月被遣返回国后，立即以山口淑子的真名重登影坛，又拍了许多电影。一九五〇年赴美，在美国影城好莱坞和百老汇等地演出。一九五一年，与雕刻家美籍日人勇·野口结婚，五年后离异。一九五八年，退出影坛与外交官大鹰弘结婚。一九六九年，出任电视台宽屏幕主持人，为了采访新闻跑遍了世界各地。一九七四年，被选为参议院议员。一九七八年，曾以环境厅政务次官的身分，访问了别离三十二年的中国。

本书是山口淑子以其前半生的坎坷经历，所写的一本带有传奇色彩的自传体纪实文学作品，在文字上，语言风格俗学家藤原作弥先生做了加工润色。全书内容翔实，且兼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插话，既是她对自己假冒中国人的忏悔，又是她以见证人的身分对日本侵华的自省和揭露。作为研究日本军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侵华罪行，当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著作。

本书于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日在日本初版后，立即成为一本畅销书而走俏，不到四个月，就重印了十版。本书即根据新潮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十二版本译出。

著者作为一个日本人，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势必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甚至对某些人物有同情之处，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进行分析、辨识。

再有，著者对于一些历史事件的名称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地名，仍沿用了当年的名字，如：将“九一八事变”称之为“满洲事变”、“七七事变”称之为“支那事变”、“沈阳”称之为“奉天”、“长春”称之为“新京”、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称之为“满洲国”等等，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译者采取了直译加引号或加注的办法，未加更改。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出现一些疏漏和贻误，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八年七月

# 目 录

译者的话	(1)
第一章 抚顺时代	(1)
第二章 奉天时代	(21)
第三章 北京时代	(44)
第四章 天津时代	(67)
第五章 李香兰的诞生	(88)
第六章 新京时代	(110)
第七章 《苏州夜曲》时代	(133)
第八章 日本剧场七圈半事件	
——抢购戏票的骚乱事件	(155)
第九章 我的青春罗曼史	(180)
第十章 两个 Yoshiko	
——淑子和芳子	(203)
第十一章 虚幻的电影	
——两部付诸东流的影片	(230)

DM63/05

第十二章	《万世流芳》	(254)
第十三章	《夜来香幻想曲》	(280)
第十四章	一九四五年在上海	(307)
第十五章	再见了! 李香兰	(330)
附 章	告别了李香兰之后	(355)
结束语		(402)
译者后记		(408)



# 第一章

## 抚顺时代

我对中国大陆的回忆，要从抚顺开始谈起。

以大型露天开采煤矿闻名的抚顺，是满铁<sup>①</sup>经营的一个煤都。在它那蓝黑色露天煤壁上，筑起的螺旋状层层梯道，象漩涡般伸向谷底的情景，至今还能浮现在我的眼前。还有那沥青色的煤层、货车的行列、远处鸣叫的汽笛、工厂那飘向远方的溟蒙烟缕以及那渐渐沉入大峡谷去的红太阳……也历历在目。

我于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二月十二日，出生在中国东北辽宁省省会沈阳市（旧奉天）近郊的北烟台，生后不久，全家便搬到抚顺，所以，幼年时期的记忆，几乎全是抚顺。

那行将沉入高粱地去的满洲落日，固然迷人，而抚顺的夕阳，与规模宏伟的露天煤矿的景色相辉映，也同样令人向往。因为这里的夕阳，把开放在煤矿路边的马蓼花染得更加鲜红。

尽管煤矿的景色是那样壮观，可离我的家却很远。我的家是在市中心的东六条街，而煤矿却在南郊外。在小学时期，除了郊游或学校在授课中所组织的参观外，是很少

---

<sup>①</sup>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抗日胜利后，与中东铁路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局。

有机会到那里去的。平日，也不过是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俊子和美都里，从家门穿过市中心到南大街永安小学去上学，往返这段路程就成了固定的日程。

说起抚顺，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烟囱林立的煤矿风光。其实，它那直刺云霄的翠绿白杨树，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抚顺的街道很整齐，从东七条街一直往东行，再从东三番町的拐角到抚顺神社之间，所形成的棋盘式街道，无处不栽着成行的白杨树。

说来，抚顺市是一个贯彻日本国策、促进资源开发的生产蓬勃发展的煤矿城市，它也曾战战兢兢地经历过抗日匪徒（指我抗日游击队——译注）袭击的艰难岁月。但对于当时我还是个幼稚无知的少女来说，却认为抚顺是个挺拔的白杨树林荫道和露天煤矿的峡谷美景共存的宁静的丘陵城市。那里还有我那些好朋友、慈祥的父母和可爱的姐妹们……

不过，这种和平的景象，也只是延续到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爆发为止而已。

我在这个抚顺市一直生活到十二岁，对祖国日本，直到十八岁秋首次作短期访问之前，还一无所知，只是个所谓“生在满洲，长在满洲”的人。

我在日本人的社会生活中虽说口语，但从以“李香兰”这一中国艺名出现于舞台后，就一直说中国话、用汉语演唱，所以有一半我也是个国籍不明的人。

战前，我是个不懂世事、被时代的潮流所驱使的女孩子，也曾想兼爱两个国家——一个是祖国，一个是故国，但事实上这两个国家却互相对立，最后竟发生了战争。

不过，直到很久的日后，我才深深地尝到了类似双重

国籍者的悲哀。在抚顺时代，我还是个懵懂无知、极其平凡的女孩子。

我是双亲的长女。

父亲山口文雄于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出生在九州佐贺县。我的祖父山口博是个出身于武士家族的汉学家。父亲在其熏陶下，也学习了汉语，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即一九〇六年（明治三十九年），因向往大陆而到了中国。

父亲在北京学习了一段之后，经知友介绍，到满铁任职，后又从烟台采煤所转到抚顺煤矿。因擅长汉语，又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和民情，便一方面给满铁社员讲授汉语和中国情况，一方面似乎还兼任抚顺县顾问之类的工作。

我之所以能说中国标准的北京话，其基础教育全受之于父亲。父亲同当时来到中国的一部分日本青年一样，都具有“国士”之气质，但他在汉语学习方面，是非常用功的，所结交的中国知友和朋友也较多。

父亲在进入满铁之前，曾在北京的汉语专门学校——同学会学习。就在那一时期，他结识了李际春和潘毓桂两位中国朋友，他们都是战前的亲日派，一个是金融界的重要人，一个是政治界的重要人，他们按照中国的风俗，与父亲交兰换谱、结拜为义兄弟。因此，遵照同样的惯例，自然我也成为他们的义女（即干女儿），并得到了两个中国名字——“李香兰”和“潘淑华”。

母亲也是九州人，出身于福冈县。母亲的父亲石桥近次郎原经营驳船批发商，后因铁路发达，买卖维持不下去，便举家到朝鲜的京城（即汉城）谋生。后来为了投奔

在抚顺经营碾米厂的叔父而又移居中国。

父亲山口文雄比母亲石桥爱大五岁，他们是在抚顺相识结婚的。究竟是恋爱结婚还是经媒人介绍相亲结婚，我不得而知，因为出生在明治时代的人对此却讳莫如深。

父亲尽管在日本学了汉学和汉语，以后又在北京的同学会进修过，但按日本的学制，也只能算是自学者，而母亲却不同，她是个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的所谓知识阶层的女性。

母亲的教育方针十分严格，特别是对于礼节规矩要求得更严。由于我的算术不好，就让我到寄宿在东本愿寺（抚顺别院）的一位学生处进行补习。

但是，母亲也有孩子气的一面，当我们一些小孩子在院子里玩泥巴时，她不但不叱责，还加入我们的伙伴当中，奔跑嬉戏弄得满身是泥，充分显露出她那爽朗的性情。

在学科方面，我喜欢国语和音乐，最头痛的是算术和体操，最拿手的是音乐。不论父亲还是母亲，都对我这个长女默默有所期待，非常注重对我的教育，但并没有象日本本国那样，因为是女孩子，就让我学习茶道、插花、烹调和缝纫等。

相反地，却让我学习小提琴、钢琴和日本琴等。我从学校回来，既要和要好的“三个小伙伴”一起玩，又要每隔两天去练一次音乐，晚上还要去听父亲的汉语讲座。尽管还是个孩子，但每天还真有些忙呢！

由于我喜欢唱歌，唱得也算不错，所以也曾代表年级在游艺会或音乐会上独唱过。

父亲之所以非常认真地教我汉语，是由于他自己拥有

什么满铁顾问呀、抚顺县顾问呀等几个暧昧的头衔，因此似乎也在暗暗地期待着我——将来能很好地利用汉语去从事中日关系的工作。例如，希望我专修政治家的秘书或翻译等的工作，将来能成长为一个政治家或新闻记者。

我上幼儿园时期，父亲只要有时间，就让我坐在桌子前面，面对面地教我汉语发音。到上小学时，就让我去上由他自己担任讲师的满铁研修所的汉语夜间讲习班。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和大人混在一起被当成了一个真正的学生。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不论在地理上、历史上还是民族上，都是个拥有辽阔土地的国家。所用的语言，笼统地说是汉语，但却有好多种。日本虽也有青森腔和鹿儿岛腔等互不相通的方言，但和中国的方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中国的方言，与其说是方言，还不如把它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外国语。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只要地方环境不同，语言就不同，相互之间的意思就难以沟通。但其中却有一种正统的全国通用的语言，就是父亲教给我的这个标准的北京话。

在战前的日本，由于受明治维新的欧化思想洗礼，在学校里，只重视英、德、法等西洋外国语的教育，很少有把汉语列入正规的语学教程。

因此，象父亲一类好学的人，当时就只好走这样一条路线——先到日本的私塾去学汉诗和汉文，然后再到北京的同学会或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去进修作为实用语学的汉语或有关中国的知识。

当时，被广泛应用的汉语教科书，就是《急就篇》。《急就篇》是宫岛大八所编辑的惟一的一本日本人学习汉

语的课本，在战前享有很高的声誉。宫岛大八这个人，在明治初期曾和川岛浪速（川岛芳子的养父）、二叶亭四迷<sup>①</sup>等人，一起在外国语学校学习汉语，但由于反抗政府轻视汉语的倾向，始终借助“善邻学院”来贯彻他们的在野精神，是一位汉学硕学家。

父亲也是靠这本《急就篇》学习了汉语，然后又到中国进行了实地磨练。他作为讲师给抚顺的满铁社员讲授北京话时所用的课本，也是这个《急就篇》。而我这个听讲的女儿，从初级到高级所用的课本，同样也是这个课本。

当时在满铁工作的日本社员，为了能充分与中国人互相沟通意思，学习标准的北京话已被定为一种义务。

当时，在全国统一的国家考试中，语学的鉴定资格，从初级到高级分为：四等、三等、二等、一等和特等五个级别。满铁规定：如不具备鉴定资格者，就不能被录用为正式社员，而且级别越高、薪金也随之增高。所以，听讲者的学习热情都很大。

父亲讲授汉语，是在白天下班后的晚间开课。在抚顺满铁研修所的讲堂里，每晚都挤满了众多的日本社员。我在小学低年级时，上的是初级班，四年级时就取得了鉴定四等的资格，到了高年级时，我就上了中级班，并在六年级时取得了三等的鉴定资格。

父亲给我这个短发少女起了个绰号，叫“小豆豆”。在研修所里，我是惟一的一个小孩，而且是红一点的旁听生。父亲每次都先做示范——先一个一个地教生词发音或

---

<sup>①</sup>二叶亭四迷（一八六四～一九〇九）：本名长谷川辰之助，日本著名小说家。

朗读文章，然后再详细讲解意思和用法，最后再让全体学生一起跟着朗读或让每个学生轮流复诵。在大人朗读完了以后，最后父亲则叫：“淑子，你发音看看！”接着又说：“好，你再说说意思！”当我一一回答后，父亲总是满意地点点头。

最近，我已几乎根本不用汉语，也无意在这里奢讲什么，只是想在这里谈谈北京话的发音，是一种非常复杂而又困难的音韵。

例如送气音：数字的“七”读音是“qi”，但如果用不送气音去读“qi”，就变成了“鸡”的意思，有遭致误解的可能。

父亲总是用通俗易懂的办法来教导这类发音。例如，在进行送气音的“qi”的发音练习时，父亲曾用了这样一个办法——“各位，请拿出一张草纸，但不是用来擦鼻涕。请把草纸割成细长的短条，再用口水把一头弄湿贴在鼻头上。”“对，就是这个要领！然后发个“qi”音看看！来，一、二、三，qi、qi、qi！”

大人们全在鼻头上粘着一条细长的草纸，一起“qi、qi”地念起来。这光景，在别人看来也许会觉得滑稽可笑，可是父亲的学生，包括我在内，都学习得很认真。

我除了会说父亲专门所教的汉语外，则是个极其平凡的女孩子。

我同近邻医院的小姐柳濂俊子以及邻居高级饭馆的女儿小川美都里，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是同班的很要好的“三人帮”，不论干什么都在一起，就是学习小提琴和钢琴，也是同往同归。

不论干什么三个人都必须步调一致。例如，做衣服，要到同一服装店去订做同样衣服、在同一天做成；要背同样皮革背包、穿同样的靴子；每月要在同一时间到同一理发店、剪成同样的刘海型发，而且发带也是同样的。如果由于什么差错，谁违反了“协定”，那在三个女孩子的“世界”，就要成为生活上的一大问题。就是说，那是个既平凡而又和平的孩提时代。但是，在当时的大人世界，已被战云所笼罩，当我上到小学六年级的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九月，中日十五年战争的炮火已在抚顺近处点燃，爆发了“满洲事变”。

这次事变，是由日本军部所策划的一次爆炸铁路事件，即“九·一八”事件。地点在离抚顺西仅五十公里的奉天郊外的柳条湖（当时叫柳条沟）。

从这时起，事实上我已背上了时代之子的命运，但在孩子们的世界，仍然悠闲自得，对这次爆炸事件的情况，根本没有留下什么记忆。

可是，对于第二年的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某天晚上的事件，日后却深深地印在脑海里，至今还时常在梦中依稀可见。

我还记得：在深夜里被叫起来，我揉搓着惺忪的睡眠，从床上爬起来定睛一看，母亲已吓得脸色苍白，父亲已穿好衣服正准备出门。尽管是深夜，可外面却是车马往来、人声喧嚣，一片嘈杂。父亲对我们说：“事变也许要变得很严重，要起来做好准备，不论发生什么事，也不要离开母亲。”

那时我十二岁，正上抚顺女学校（初中——译注）的



一年级，弟妹四人都还很小。父亲对我说：“淑子，你是姐姐，可要坚强些”，说完后就匆匆忙忙地走出去了。可我却茫然不知究竟怎么做才算是坚强。我问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母亲只是说：“有人来把你父亲叫到满铁事务所去了。”

母亲象老母鸡抱小鸡似地把弟妹们搂抱在一起，可能一夜也没合眼。天还没亮，母亲对我悄悄地指了指窗户那边。

我提心吊胆地走近窗边，又悄悄地把木板套窗打开一道缝隙，贴着窗缝往外一看，只见天空被染得通红。

建筑物的屋顶以及林立的白杨树，就象影戏中的黑色剪影矗立在眼前，而其背景却是熊熊燃烧的火海，火舌就象在来回地舔噬着远方的夜空。“火灾！”我心里意识到了，但没敢出声。尽管是热天，却不由自主地上牙打下牙冷得直打颤。

在我幼小的心灵上，从起火的方位看，也知道那是露天矿的采煤厂，同时也明白那不是一般的火灾事故。因为采煤厂离我家很远，如果是一般的火灾，母亲也不致于吓得如此面无人色。尽管街道上灯火辉煌，可给人一种骚然、不安的气氛。

母子六人相偎在一起，过了一些时候，火势总算逐渐熄灭了。熊熊的火焰也象要和朝阳配色，渐渐被吸收了。天亮了，身边就象未曾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们再次上床睡觉，弟妹们马上就呼呼地睡着了，唯独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于是，我又走到窗边，开窗向外一瞧，天已大亮。我把下腮靠在窗边，再一次回想起刚才曾把夜空烧红了的火焰的恐怖。

随着朝阳的普射，眼前的土色也鲜明地浮现出来，抚